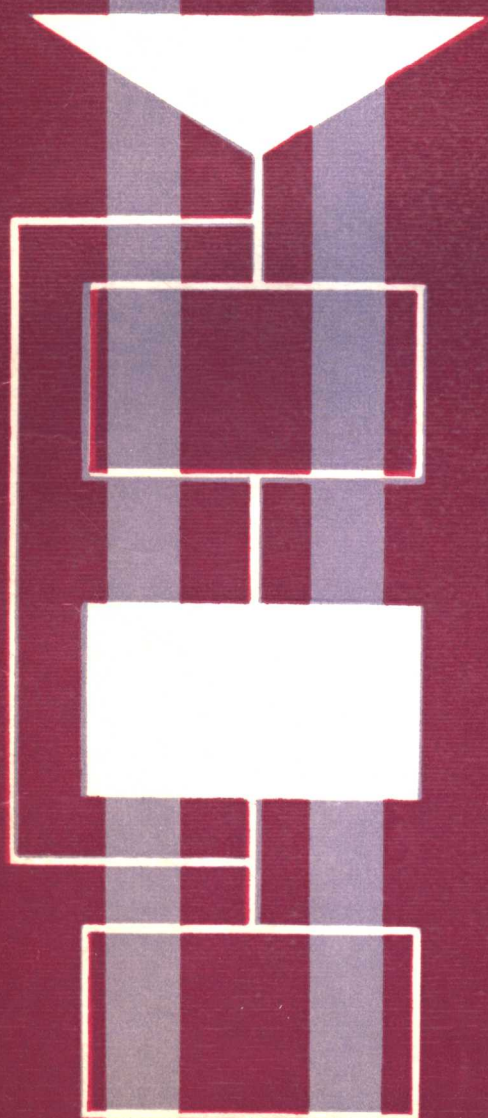


陆致极

汉语方言数量研究探索



语文

HANYU FANGYAN SHULIANG YANJIU TANSUO

汉语方言数量研究探索

陆致极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074号

HANYU FANGYAN SHULIANG YANJIU TANSUO

汉语方言数量研究探索

陆致极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16 8印张 160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4.50元

ISBN7-80006-288-0/H·89

前 言

陈原教授在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我个人认为,现今的方言研究,循着老方法是很难得到突破性发现的。只有完成从定性到定量分析(然后反过来进行定性工作)的过渡,语言学才能找到自己的新天地。”这是十分精辟的见解!

目前汉语方言的研究,主要是对语言或方言“特征”的描写和比较。就方法论而言,这是一种定性的分析。然而,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是离不开它的量的规定性的。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在语言系统中,各个特征之间存在着“量”的关系。各个特征本身也有其构成成分的“量”的存在。因此,很有必要在理论和方法上作出新的开拓,使方言的描写和比较由定性分析推进到定量分析,由定量分析反过来深化和验证定性分析,从而使汉语方言的研究走上精密化、科学化、现代化的道路。本书正是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初步结果。

本书第一章“引论”评述了国外现代方言学中出现的传统框架、结构主义框架和转换生成框架、以及计算机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作用,同时也回顾了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对现代汉语方言学目前理论框架的基本特点作了讨论。

第二章至第七章是从不同的角度具体探讨汉语方言数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三章探讨在“综合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方言分区的数量方法,并对相关分析、聚类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及计算机程序的应用作了介绍。

第四章针对目前理论框架中“特征中心”的局限性,提出了“系统中心”的理论框架,同时运用新的理论模型,对汉语17个方言间的亲疏关系作出了数量描写。

第五章尝试把这种理论框架应用到古今方音比较的领域(或历史音韵学领域)。从系统的数量比较的角度,对《中原音韵》声母的分类和拟音作了探讨。

第六章探讨根据音变在地域分布上的“投影”,利用计算机建立和搜寻“分化归类树”的方法。

第七章从现实交际出发,探讨各方言间在语音感知上差别程度的数量描写方法。

本书的工作是作者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期间完成的。因此首先应当感谢伊利诺斯大学语言学系郑锦全教授。如果没有亲自接触到他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这本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作者还要感谢复旦大学生物系顾凡及副教授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姚德成副教授在数学和计算机方面曾给予作者的帮助和指教。对于陈原教授以及作者在复旦大学的师友们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作者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书的工作是探索性的,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一定不少,恳请各方面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引论	(1)
一、现代方言学在西方的发展	(1)
二、汉语方言学和它目前的理论框架	(7)
三、计算机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12)
第二章 综合判断和方言分区方法(上)	(18)
一、特征判断	(18)
二、方言间距和方言间距地图	(20)
三、聚类分析和方言分区	(29)
附录: BMDP软件包中P1M聚类分析程序的应用	(34)
第三章 综合判断和方言分区方法(下)	(39)
一、《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39)
二、相关分析	(43)
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分区	(50)
第四章 “地域——历时——系统”模型	(53)
一、建立“系统中心”的理论框架	(53)
二、汉语方言亲疏关系的数量比较方法	(56)
三、汉语方言的亲疏关系和分区	(65)
第五章 古今方音的数量比较	(70)
一、《中原音韵》及其研究	(70)
二、各家对《中原音韵》声类及其音值的看法	(72)
三、样本、方法和计算结果	(76)
四、音系性质和方法论	(82)

第六章 “分化归类树”探讨	(85)
一、基本构想和计算方法.....	(85)
二、中古入声韵尾演变的“投影”	(89)
三、“音变事件”到“音变阶段”	(92)
四、层级的因素.....	(95)
五、分化和归类.....	(99)
第七章 方言间语音感知差别的数量描写	(101)
一、北京话声母的心理相似度和知觉结构.....	(101)
二、方言间语音感知上的接近程度.....	(107)
三、语音单位的出现频度和计算结果.....	(112)

第一章 引 论

一、现代方言学在西方的发展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这就是说，在语言形式上，它跟民族共同语或其他亲属方言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特点。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它以自己独特而完整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充当着人们相互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直接以各种方言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便构成了语言学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方言学。

现代方言学诞生于19世纪末叶。它是在当时欧洲盛行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直到本世纪60年代，方言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在语音方面展开的。因此，在音系学方面，方言学跟现代语言学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历史语言学关于音变的不同的理论，往往直接影响到方言学具体研究的方向和成果。就西方语言学发展而言，在现代方言学领域中，出现过三种不同的流派：传统方言学、结构主义方言学和转换生成方言学。^①

传统方言学的理论框架脱胎于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引起19世纪欧洲语言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各个语言中存在着的 irregular 的现象；一个是不同语言之间具有相似的特征。要对这两方面现象作出解释，就不能不涉及语言昔日的面貌以及语言演变的一般性质。于是，研究的兴趣便集中到语言的历时方面去了。

为了系统地解释语言的演变现象，“新语法学派”^②提出了关于语言发展的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语音演变无例外”原则；另一个是“类推”原则。“语音演变无例外”是指语音演变的方向对语言社团的成员都是一致的；符合音变条件的所有的词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化。因此，支配音变的规则是纯语音学的，它们独立于词的词法、句法和语义功能；这些规则是“无例外”的。换言之，“新语法学派”深信，语音演变都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具有某种“机械”性质。所以刻画这些演变的音变规则，必须对所有符合其条件的语言材料作出说明，不能允许有例外现象存在。如果有例外，那就是在语音演变过程中还存在着另一些音变规则，只要把它们找出来便能予以解释了。至于“类推”原则，主要用来说明在语言的某些规则模式的影响下，句法和构词形态发生变化的过程及其结果。

要验证这样的原则，无论是肯定它们还是否定它们，光靠在历史文献基础上拟构出来的语言演变图式是不够的，必须在活的方言口语中找到证据。于是，系统的科学的方言研究出现了。同时，在“新语法学派”的影响下，形成了传统方言学的理论框架。

① 本书讨论的“方言”只限于地域性方言。如果把“社会方言”(即语言的社会性变体)也考虑进去的话，西方还有社会语言学的方言学流派。

② “新语法学派”也称“青年语法学派”，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勃鲁格曼、保罗，丹麦的维尔纳、汤姆生等。

构成这个框架的基本假设是:(1)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方言)是由较早时期的统一的基础语或原始“母语”分化出来的;(2)语音上的变异是由作用于基础语的那些机械性的音变造成的,虽然某个音变在特定环境下是“无例外”的,但不同的音变影响着语言的不同方面,就产生了变异;(3)尽管有许多因素,像类推、语言或方言之间出现的语言成分的借用等,阻碍着音变的那种机械性的动力,但语言总是在不断的分化。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基础语分化为方言,“母语”分化为“子女”语言。只有非语言的力量,诸如战争、政治统治等,才使许多语言和方言消亡了。

不难发现,这个理论框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项目中心”或“特征中心”。这也就是说,研究的着眼点总是集中在个别语音(或其他语言特征)及其变体在地域上的分布这样的事实上,并不把它们跟整个方言的结构联系在一起。因为研究的目的是要探寻各个音变的踪迹。这种理论框架下绘制出来的方言地图最能显露这个特点了。一幅方言地图就是用线条绘出的一个方言特征的地域分布图。在地图上表示这个特征分布境界的界线,叫作“同言线”。把代表不同的方言特征的同言线画到一幅地图上,就得到了一幅综合的方言地图。尽管这些线或者部分重叠,或者相互交叉,错综复杂,它们各自还是代表着分散的个别项目或特征的分布,并不透露出它们各自在方言系统中的相互地位。从本世纪初出现的著名的席业隆《法国方言地图》,到目前正在出版的许多方言地图册,可以说,大多遵循着这样的格式。

偏重于历时研究是这个理论框架的另一个特点。这反映在对方言项目的选择和解释上,往往是从单纯的历时角度出发的。例如,根据《美国方言调查》^①绘制出来的《北部地区语音方言地图》^②就假定中古英语是一个统一的音系,而一系列的地图就在于表明中古英语的各个语音特征在英国北部地区的现代反映形式。至于这地区目前到底存在着几个不同的方言音系,从这些地图中是无法知晓的。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印欧语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经赢得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评价。^③然而,它只重历时,疏于共时的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当历史跨进了20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为奠基者的结构主义新学派^④。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提出的关于语言和言语、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区分的理论,就是针对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论缺点的一种反动。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语言是一个系统,它所有的各部分可以并且应当从它的共时整体中去考察。”^⑤换言之,每一个语言成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地位是由它在整个系统中跟其他成分之间形成的对立关系来决定的。因此,研究的重点应当由个别的语言成分转移到作为整体的共时系统上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语音演变现象,就会发现,任何音变都不再是单纯的跨越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个别语音的变化。个别语音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个语言结构的变化。或者说,它会产生语言的新的系统。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50年代后方言研究中也出现了结构主义方言学流派。从

① Harold Orton等著, Survey of English dialects. 4卷, 1962—1971。

② Eduard Kolb (1966), Linguistic atlas of England, Phonological atlas of the northern region, Berne, Francke Verlag.

③ 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巨大地成功地发展着的历史语言学”(338页)。

④ 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包括以特鲁别兹柯伊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以耶姆斯列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和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⑤ 《普通语言学教程》124页,巴黎,1922年。

结构系统着眼, 语音变化的结果可能引起方言音系中音位单位的增减, 也可能仅是分布上的变化。比如说, 一个方言音系中原来有五个元音音位, 构成了十种相互之间的对立关系。当增加一个元音音位时, 可能会造成整个系统上的调整, 这时或许会出现十五种相互对立的关系。这是在音位集合和音位关系上出现的变化。但还有一种情况。经过语音的分裂和合并, 音位数目仍然相同, 其内部的分布却发生了变化。例如, 某个语言有 /i, e, æ/ 三个前元音。经过语音的分裂, 一部分原来有元音读 /e/ 的词变成了 /ɛ/, 结果就产生了有四个前元音的系统。接着又出现了语音的合并。这部分元音为 /ɛ/ 的词又变成了 /æ/, 跟原来那些就是 /æ/ 的词合流了。于是又回到三个前元音组成的音系。如果有方言甲、乙、丙, 它们正好反映了这种音变的过程。方言甲保留着这种语言的原来状态, 是三个前元音的系统; 方言乙经历了语音的分裂, 是四个前元音系统; 方言丙不仅经历了语音的分裂, 还完成了上述语音的合并, 因此, 它也是三个前元音的系统。在传统框架下, 学者们感兴趣的只是某些代表了这种音变的词项或语音特征。他们会列出这个特征或项目, 描写它在不同地域内的分布: 在方言甲地区内是 /e/; 在方言乙地区内是 /ɛ/; 在方言丙地区内是 /æ/。然而, 在结构主义的方言学者看来, 重要的不仅仅是要指明方言乙跟方言甲、丙之间在音系上的差别, 而且还要揭示方言甲跟方言丙之间在结构分布上的差别。语音在分布上的差别也是音变的结果。因此, 方言间的比较要建立所谓“对应系统”(diasystem)①。这种“对应系统”的差别, 不光表现在音系的音位集合上, 也表现在它们的分布上。

然而,“对应系统”的观念尚未把方言的地域分布因素充分考虑进去。一些结构主义方言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历史——地域——结构”这样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 传统方言学已经把历史和地域结合起来了; 结构主义语言学关注共时结构的研究, 结构主义的观点推行到历史语言学领域, 又把语言的历时演变跟语言的结构联系起来了。现在, 结构主义方言学则要把这两个方面熔于一炉。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 结构主义方言学者尝试把历时的、地域的和结构的信息统统绘制到同一幅方言地图上去。

例如, 莫尔顿曾根据《瑞士德语方言地图集》②的材料, 来编绘这类地图。③在瑞士北部的德语方言, 如果仅考虑中元音和低元音的话, 莫尔顿认为有三种不同“形状”的长元音系统, 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元音结构。第一种结构由七个元音组成, 其分布是“三三一”形式(即最高层和次高层分别是三个元音音位, 而最低层则仅有一个元音音位), 呈现出三层的三角形形状。他用▽来表示。其前元音是 /e:/ 和 /ɛ:/。第二种结构由八个元音组成, 也是三层, 分布是“三三二”形式, 呈现为正方形。他用□来表示。其前元音是 /e:, ɛ:, æ:/。第三种结构由五个元音组成, 也是方形, 但只有两层, 分布是“三二”形式。他用距形 □ 来表示。其前元音是 /e:, æ:/。莫尔顿认为这三种结构都是中古高德语历时音变的结果。中古高德语音系中前、长元音有两个: /e:/ 和 /æ:/。中古高德语到现代瑞士德语的发展过程出现过前低元音抬高的音变, 在不同的地域表现为 /e: ~ ɛ: ~ æ:/ 的分布。因此, 莫尔顿就用一个

① “对应系统”首先是 Weinreich 提出来的。参阅 U. Weinreich (1954): “Is a structural dialectology possible?” Word 10. 388-400.

② R. Holzenköcherle, Sprachatlas der deutschen Schweiz. 4卷, 1962—1975.

③ W. Moulton (1968): “Structural dialectology”. Language 44. 451—466. 以及 (1968) “The mapping of phonetic system”, in Verhandlung des zweiten internationalen Dialektologenkongresses, 574—591.

小黑方块■来表示这种音变。如果它出现在以上结构“形状”的中部，如▽，就表示该结构中的/e:/是由中古高德语音系中的/æ:/变来的，如果它出现在结构“形状”的上部，如■，就表示这结构中的/e:/也是由中古高德语中的/æ:/演变来的。就这样，莫尔顿把跟现代三种结构有关联的音变现象，统统用不同的符号绘制到方言地图上去了。当然，在这样的方言地图上，符号的复杂和拥挤是可想而知的。^①但它反映了结构主义的方言学者对其理论的大胆实践。

正当传统方言学者们还在辛勤地开拓研究的实际领域，正当结构主义方言学者们埋头实验着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西方语言学中又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就是以乔姆斯基50年代末出版的《句法结构》为标志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崛起。

在转换生成语言学看来，要对语言作充分的描写，不能不首先考虑语言的“创造”性质。一个说本族语的人会理解和说出他过去从未听到过的句子。这个简单的事实表明，说话人具有某种关于他本族语的“知识”或者“能力”。这种“知识”或“能力”使他能够“生成”出这种语言的所有合格的句子来。因此，语言学家应当设计出一种理论模型来揭示说话人所具有的这种能力。

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要略》(1965)中提出的“标准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模型。这个理论模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句法部分、音位部分和语义部分。句法部分具有“生成”的性质。在句法部分内部，由“短语结构规则”产生句子的基本结构，然后由“词汇规则”插入“词项”，构成句子的“深层结构”。“转换规则”再把“深层结构”转换为句子的“表层结构”。音位部分和语义部分具有“解释”的性质。音位部分通过“再调整规则”把句子的“表层结构”的词汇表现为抽象的“底层音位表达”，然后经过一系列“音位规则”的操作，把这种抽象的底层音位表达转变为“语音表达”，最终得到句子的语音形式。语义部分则作用于“深层结构”，通过“语义解释规则”把句子的句法结构跟它的“语义表达”联系起来。显而易见，转换生成语法体系就是一个庞大精细的规则系统。它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个规则系统的“输出”，即句子的语音表达和语义表达，而是怎么样的规则又以怎么样的序列来产生这样的“输出”。

于是，新的“规范”的建立，又给人们提供了观察和认识问题的新的角度，由此在方言研究领域里产生了转换生成方言学派（或“生成方言学派”）。

如果说结构主义方言学的理论框架是“结构中心”，那么，转换生成方言学的理论框架则是“规则中心”了。既然词汇表层的语音形式是通过音位规则从它们底层音位表达中派生出来，那么，方言间的语音差别就很可能就是对底层音位表达发生作用的音位规则的形式、数目和序列的差别造成的，而它们的底层音位表达则完全相同。例如，英语desks（“桌子”，复数形式），大多读为[desks]，但也有读成[des:]和[des]的。在某些黑人英语中，更有读成了[d'esɪz]的。从转换生成框架出发，它们的底层形式被认为是一致的，即/desk+z/，其中“+”是语素界限符号，/z/是表示复数意义的语素。从底层音位表达达到表层的语音形式，涉及到三条音位规则：（1）后缀调整规则：后缀/z/在咝擦音（如[s]、[z]等）后改写为[ɪz]；在清辅音后改写为[s]；在浊辅音后改写为[z]。（2）结尾辅音丛简化规则：处于语素末尾位置

① 针对Moulton的工作，另一位结构主义方言学者Goossens提出了改进意见。他用同言线来指明发生音变的区域，而把音变内容用一个抽象的图式来表示，这样就不必像Moulton那样把各个表示“历史——结构”的符号直接绘制到每一个方言调查点上去了。

上的/p,t,k/,如果前面是/s/的话,则被删除。(3)重叠取消规则:连续两个相同的辅音(即此辅音延续时间较长)则改写为一个这样的辅音(读为短音)。*[desks]*、*[des:]*和*[des]*的差别正是因为对它们发生作用的规则数目不同而造成的:

底层形式	desk+z	desk+z	desk+z
(1)后缀调整规则	desk+[s]	desk+[s]	desk+[s]
(2)辅音丛简化规则	——	des+[s]	des+[s]
(3)重叠取消规则	——	——	des
表层形式	[de:ks]	[des:]	[des]①

至于黑人英语中的[d'ɛsɪz]则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因为规则次序的颠倒或重新排序,即先使用“辅音丛简化规则”,然后再使用“后缀调整规则”:

底层形式	desk+z
(2)辅音丛简化规则	des+/z/
(1)后缀调整规则	des+[ɪz]
表层形式	[d'ɛsɪz]

第二种解释是,在黑人英语的这种变体中,末尾的/k/在表层中从不出现,因此可以假定它的底层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因/k/的脱落而得到了“重建”(restructuring)。“重建”后的底层形式便成了/des+z/。它只经过“后缀调整规则”的操作就得到[d'ɛsɪz]这样的表层语音形式。

由此可见,转换生成方言学者们致力于发掘各个方言之间的底层对应音位系统(underlying diaphonemic system),在这样的基础上,通过对造成差异的规则数目、范围、次序和形式作细致的比较,来揭示方言之间差别的程度。例如,范西留曾经对罗马尼亚方言资料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方言在地域上的差别很大程度只是同样的规则因不同的操作序列而造成的。②他确定了11条音位规则。这些规则并不都出现在所有的方言里。但这些规则使用的不同次序可以解释方言之间的差异。比如,在南部门泰兰(Muntenian)方言的三个次方言里,规则的序列是:(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不同的规则)

- 门泰兰方言A: (A—B—C—D—E—F—H—I—J—K)
 Ba: (A—B—C—D—E—F—J—K—G—A)
 Bc: (A—B—C—D—E—F—H—I—J—K—G—A)

而北部的莫达维(Moldavin)方言的两个次方言里,规则的序列是:

- 莫达维方言A: (A—B—E—F—H—I—J—K)
 B: (A—B—E—F—C—H—I—J—K)

即使不讨论规则的具体内容,只要对比规则以及它们序列的差别,也已经可以窥见这些方言或次方言之间的差别状况了。同时,历时音变和共时的地域分布也通过规则的形式联系起来了。

这种研究的角度也同样反映到方言地图的绘制上。如果说传统的方言地图是把原始调查

① 至于/e/实现为[ɛ]则是由英语的语音规则造成的。这里仅讨论音位规则。

② E. Vasiliu (1966): "Towards a generative phonology of Daco-Rumanian dialect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79-98.

资料的各个项目逐个地标记到地图上去，那么，转换生成方言学者们则在尝试把造成差别的不同规则的作用和扩散标记到地图上去。

从上面我们对现代方言学在西方的发展所做的鸟瞰式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就现代方言学这个领域而言，已经出现过三种不同的框架：传统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和转换生成理论。但没有一种理论框架能一统天下。至少直到目前为止，方言学者们仍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因为新的理论框架的确立，只是标志着某种研究着眼点的转移，标志着一种新的观察和挖掘问题的角度的出现，标志着对现存问题的一种新的解释途经的开辟。在这个意义上，这三种理论框架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它们一起构成了现代方言学所具有的十分丰富的内容。

二、汉语方言学和它目前的理论框架

汉语是世界上方言现象比较复杂的语言之一。据文献记载,早在先秦时期,汉语方言的分歧已经十分明显了。因此,方言的概念,最早大约出现在我国的周代,就是所谓殊方异语。

汉语方言的研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西汉末年出现的扬雄《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方言》记录了周秦到西汉末年大量的民间词语,揭示了西汉时代汉语方言的分布状况,是汉语方言史的极其珍贵的材料。它重视口语调查,创立了从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关系去考察语言变化的原则,更是难能可贵。《方言》问世以后,晋代有郭璞的《方言注》,举出了晋代许多方言跟扬雄所记的方言作比较。郭注的材料对了解扬雄以后200多年汉语在词汇上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郭璞以后,在方言词汇研究方面,主要有两类著作:一类是专从古文文献里找方言词汇来续补扬雄的书,如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等。另一类是专为方言俗语考证其来源的著作,如钱大昕的《恒言录》、吴文英的《吴下方言考》、翟灏的《通俗篇》等。这两类著作大都出现在清代,因为清代是我国传统小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也是传统汉语方言学的发展时期。这些著作对研究汉语方言词汇的演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当时浓厚的复古主义风气严重地阻挡了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始终在文字里兜圈子,很少晓得从语言出发。”^①无怪乎罗常培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可惜从中国语言史上发达最早的词汇学,从《方言》以后,就这样黯淡无光,不能使第一世纪左右已经有了逼近语言科学的方法继续发展!”^②

在汉语方言研究史上,除了扬雄《方言》之外,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年)也具有特殊的地位。《中原音韵》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曲韵韵书。它适应元代北曲的发展,为统一当时的戏曲语言而作。由于它摆脱了传统仿古韵书的羁绊,直接以当时北方话的实际口语为对象,记录了当时北方话口语的语音面貌。在汉语方言研究史上,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可惜在《中原音韵》问世后的近600年间,这种系统描写口语的传统并没有在传统汉语方言学中发扬光大。

“五四”运动汹涌澎湃的新思潮,带来了我国整个学术文化的巨大变革。正是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汉语方言研究的方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借鉴了西方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并采用了现代语音学的手段和成果,提供了全面研究方言、特别是研究口语的目标。于是,汉语方言研究出现了蓬勃的生气。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小学”即我国传统语言学跟现代语言学的分界线,那么,它也是从文献材料诠释、考证为中心的传统汉语方言学和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分水岭。

“五四”以后,方言的研究首先是由民间歌谣的研究引起的。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在搜集、整理民间歌谣的过程中,人们感觉到了了解方言的迫切性,于是,1924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发表了宣言,规定了调查任务,制定了一套以国际

① 罗常培《扬雄〈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178页。

② 同上,179页。

音标为基础的记录方言的字母，并且标注了14种方音作实例。从此，方言调查工作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0年代，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第一个取得卓越成就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高本汉利用现代语音学的方法，调查了多处现代汉语方言，并以此为基础，运用历史比较法来拟构汉语古音，写下了《中国音韵学研究》。高本汉的成就和调查研究语音的方法，在我国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语言学者深刻地认识到系统地调查汉语方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27年，清华学校组织了吴语调查。随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倡导和组织下，在1928年至1936年间，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作为调查活动的最早成果是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这是20年代出版的第一部用现代科学对方言作研究的调查报告。此后，陆续出版了不少方言研究著作，如陶燠民的《闽语研究》(1930)、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1)和《临川音系》(1941)、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1939)和《中山方言》(1948)、黄锡陵的《粤音韵会》(1941)、赵元任、丁声树等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等。这些调查和研究的成果，表明现代汉语方言学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独立部门已经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语方言研究更有长足的前进。首先表现在汉语方言的调查上。为了有效地推广普通话，1956年开始组织全国范围内的方言普查工作。大约有两年时间，方言普查活动几乎遍及了神州的县市。1960年后，各省方言工作转入以总结成果、编写“概况”为重点的新阶段。这次普查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298个汉语方言点(以县为单位)，已普查过1849个，编写出调查报告1195种，学话手册320种(已出版72种)，编出“概况”一类综合调查报告有14个省，其中已出版的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河北方言概况》、《四川方言音系》、《安徽方言辨正》等。正是在普查的基础上，出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汉语方音字汇》(1962)和《汉语方言词汇》(1964)。前者包括了汉语各大方言区17个地点方言的2700余字的读音，后者共收入各大方言区18个地点方言的905条词语，都用国际音标标音。这些经过整理的材料，为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专题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少以某一方言为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相继问世。如李永明的《潮州方言》(1959)、王世华的《扬州音系》(1959)、河北省昌黎县志编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的《昌黎方言志》(1960)以及《方言和普通话丛刊》、《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等。其中《昌黎方言志》堪称这方面著作的代表。在综合研究方面，出现了袁家骅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1960)。这是解放以后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它讨论了北方话、吴、湘、赣、客家、粤、闽诸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大体上反映了过去几十年间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可以说，《昌黎方言志》和《汉语方言概要》代表了现代汉语方言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60年代中期后的“十年动乱”，汉语方言研究暂时进入了停滞时期。1976年末，经过十年的沉默以后，方言研究重新开始了兴旺的局面。1979年，《方言》杂志创刊。不少论文和著作相继问世。就著作而言，有詹伯慧的《现代汉语方言》(1981)、饶秉才等编的《广州话方言词典》(1981)、厦门大学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1982)等。朱德熙的《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等论文，标志了汉语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的开始。一些地方方言志正在编写和出版中。尤其是近

年来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讨论以及编写《汉语方言分区图集》的工作，充分表明了现代汉语方言学正在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近30年来，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台湾省、港、澳以及海外汉学界中，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杨时逢的《台湾桃园客家方言》(1957)、杨时逢整理的《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5)、《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等。如郑锦全的《普通话共时音系》(1973)、司马侃(M. sherard)对吴话的研究、余霭芹对粤语的研究、罗杰瑞(J. Norman)对闽语的研究、郑良伟对台湾话的研究、张琨的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桥本万太郎对闽语、吴语和西北方言的研究、杨福锦的《中国方言学分类参考书目》(1981)等。

在对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历史作了以上简略的回顾以后，我们打算进而探讨现代汉语方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或者说，探讨一下目前汉语方言研究中较普遍地遵循着的理论框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惜长期以来，方言研究者们重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很少讨论对整个研究来说具有指导意义的一般理论和方法。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记录和研究具体方言，跟理论无甚关系。事实上，方言学并不只是展览令人目眩的方言标本的博物馆。就像生物学家根据化石资料和动植物标本去建立生物进化的一般理论一样，要建造宏伟的汉语家族的殿堂，并进而对汉藏语系的研究和一般语言学理论作出贡献，采掘原始的方言矿藏仅是整个事业的基础工程。况且，采掘和整理矿藏本身，总是受着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制约的。理论和方法就像采矿者使用的不同的采掘工具和放大镜一样。

我们认为，现代汉语方言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

首先，这个框架是从现代方言学中的传统框架里脱胎出来的，带着明显的“项目中心”或“特征中心”的印记。比如说，在比较不同的方言时，主要是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条目或特征来作比较。以《昌黎方言志》为例。昌黎方言的分区主要依据以下8个条目形成的同言线。它们是：(1)“爱、袄、暗、岸”声母的读音；(2)“儿、二、橘儿、丰儿、瓜儿、官儿”的韵母；(3)“头·上、黄·瓜”的声调；(4)动词“没”字和副词“没”字的音同不同；(5)“倒·上，道·上”的声调；(6)“扬场，扬麦”的“扬”字声调；(7)“腌菜”的“腌”字声母；(8)“啄木鸟”的读音。其中(1)(2)两项在声母、韵母上有代表性，(3)(4)(5)在声调上有代表性，(6)(7)(8)则不及前五项重要。^①这些条目构成的同言线基本上是东西走向的，它们在空间上体现出方音的差异来。于是依此划分出南北两个区来。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合理地设计调查的项目，并从中选取较有代表性的项目来进行比较，这就构成了目前方言比较研究中的基本内容了。

现代汉语方言学虽然脱胎于传统框架，但几十年来的实践，使它已经摆脱了传统框架重历时、轻共时的偏向。我们知道，现代方言学的传统框架是在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出来的。详于求同、略于见异，重历史拟构、轻共时描写，这是历史比较法较为明显的缺陷。由于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目的是通过少量的、能反映语言规律性特征的材料来揭示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需要对当代的活的语言进行深入细致的共时描写。它往往只选择几百个基本词汇中的现象，反复比较，发现音变规律，拟构史前母语。然而，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常常不是几百个基本词汇或是少量的语音特征就能完全反映出来。在印欧系语言研究中获得成功的方法，用于其他语言并不一定能取得同样的

① 见李荣《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方言》1985年第2期。

成效。^①因此,现代汉语方言学在借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科学方法的同时,就十分注意把历时研究跟共时研究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了历史比较法的这方面缺陷。目前,我们对于一个方言的全面研究,一般采取三个步骤:第一,对这个方言本身进行调查,搜集丰富、精确的方言资料,然后对它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作出系统的共时描写;第二,拿这个方言来跟共同语作比较,找出两者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以及词汇和语法的异同;第三,把以上研究的结果,跟该语言的较古阶段进行比较,揭示这个语言分化和发展的过程。从研究的方法来说,第一个步骤属于“描写方言学”的工作,第二第三两个步骤则属于“历史方言学”的工作。^②事实上,这两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目前调查方言常用的《方言调查字表》就是参照了中古《广韵》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分类来排列的。大量的实践告诉我们,对语言现状的描写,若不联系这种语言的历史发展,对许多现有的语言事实很难作出圆满的科学解释。同样,没有精细的共时描写的材料,比较也就成了雾中看花,难收条分缕析之功。对几种不同的方言的亲疏关系的研究,则更是如此。所以,历时和共时,在研究的不同阶段,可以有所侧重,但不能截然分离,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汉语方言研究的实践,已经使它的理论框架具有了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特点。

注意联系人文历史来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现代汉语方言学理论框架的另一个特点。汉语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汉语方言的形成跟汉民族的历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客家方言的形成和它在地域上的分布,就跟客家先民在历史上的五次规模较大的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学者在对客家方言进行研究时,就注意到联系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去分析和比较它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如罗常培的“从客家迁移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③、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等。在最近的方言分区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就注意到方言地理和人文历史之间的联系。例如,上海和苏南地区吴语的方言地理就跟明清两代的行政区划“府”和“州”关系密切,因此往往可以把这些旧府或州的治所来作为方音比较的“标准点”。^④周振鹤、游汝杰《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⑤则充分利用人文历史地理诸方面因素,对湖南省方言的分区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证。在方言研究中,重视结合使用语言的民族或居民的人文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避免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分化和统一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

吸收结构主义方言学的某些因素,逐步注意方言结构上的分析和比较,这是现代汉语方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又一特点。比如《汉语方言概要》对各大方言区代表方言的阐述,从共时平面到历时平面,基本上采取了结构描写和结构比较的方法。例如在“比较音韵”中讨论方音跟普通话标准音(北京音)的对应关系时,不仅对不同方音音系中音位之间的差别和对应关系作了较详尽的刻画,而且也注意到了这种对应关系在系统中的某些分布状况。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窥见目前汉语方言研究较普遍地遵循着的理论框架的一些基本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理论框架可以概括为以下的模型:

① 参阅李振麟《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问题》,《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

②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目前一般把方言学划分为三个部门:以历史比较方法研究方言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变化和发展的“历史方言学”,以静态描写的方法研究各种方言在某一特定时期中面貌的是“描写方言学”,从绘图的方法研究方言特征在地理上的分布的是“方言地理学”。

③ 罗常培《语言和文化》附录三。

④ 见许宝华、游汝杰《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方言》1984年第1期。

⑤ 《方言》1985年第4期。

共时——历时——特征

“共时”指语言或方言的共时描写；“历时”指联系语言的历史状况进行比较。“共时——历时”，一方面表述目前方言研究的基本程序：从横切面的描写、特别是语音的描写下手，然后进一步作纵的历史的比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特点。“特征”指在描写和比较的内容上，目前主要是着眼于方言中有代表性的项目或语言特征。

如果从不同方言的地理分布着手来比较方言间的异同，这个模型也可以表达为：

地域——历时——特征

“地域”就是指不同的方言在地域或空间上的分布。“地域——历时”则意味着：一方面，通过比较，从显示着语言或方言差异的地域分布中可以看到语言或方言发展的历史序列；另一方面，联系语言或方言的发展历史，联系语言或方言的历史面貌，也能反过来帮助更加精细地揭示方言地域分布的状况。在方言的地域分布和历时的比较上，目前都是以项目或特征为比较的基本内容的，因此，“特征”是这个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否有一个能够维持常规科学传统的规范存在，是区别科学和“前科学”之间的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汉语方言学以它具有自己特点的理论框架表明，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独立部门，已经是毫无愧色了。